

研究論文

台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 比較原漢立場

傅仰止*

誌謝：

本研究分析資料分別取自 1999 年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與 2000 年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原住民專題調查」。前者屬於國科會資助的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88-2412-H-001-012），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王甫昌教授主持，實地調查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執行；後者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規劃式集體研究計畫，由伊慶春教授主持，原住民專題調查由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執行，簡文吟負責協調。本文初稿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研討會中發表（2001 年 1 月 12 日），相關文獻資料由張正衡協助收集整理。修訂稿參考研討會評論人孫大川教授及其他與會學者所提意見修訂，定稿再先後依據本刊兩位匿名評審及一位匿名編輯委員所提出之審查意見改正，謹此一併致謝。

* 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收稿日期 2001/2/12 • 接受刊登 2001/4/16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立場，如何在漢人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當中反映出不同層面的社會心理背景。文中依據 1999 年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與 2000 年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原住民專題調查」兩筆資料，分析比較漢人樣本（ $n = 3349$ ）與原住民樣本（ $n = 807$ ）各自的特色及差異。研究發現原漢族群在政策立場的背景上有明顯差異：教育程度高的漢人，明顯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但是收入高的原住民，則不如其他原住民那麼強烈支持這種政策；社會公平感在漢人族群當中有助於支持優惠政策，在原住民族群裡則變成抗拒的來源。最明顯的區別，是跟原住民的接觸經驗或型態，對漢人和原住民產生互異的效果，而在鄉村原住民和都市原住民之間的效應，也不盡相同。在東部多族群環境下的漢人，明顯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這種抗拒難以歸咎於其他相關的主客觀條件，而是由「東部」這項背景單獨發揮強烈的效應。跟其他原住民較常接觸的原住民，則顯然比較支持優惠政策。但是有利於都市原住民支持立場的接觸型態，不是極端的族群聚合，而是中等適度的叢結型態。原漢之間最為一致的趨勢，則是對原住民社經困境所作的歸因解釋，在政策立場的取向上有強烈而明顯的區辨力。研究發現不但在原漢之間的族群接觸與族群位階論述上富重要意涵，對原住民優惠政策與輔導措施之制訂及檢討亦有所啟發。

關鍵詞：台灣原住民、原住民政策、弱勢族群優惠政策、原漢關係



一、前言

台灣原住民的優惠政策實施已久。從一九四〇年代開始，政府設置原住民籍中央民意代表，也針對原住民身分的中學生制定優待辦法。到了二十世紀末，優惠政策的範圍擴及原住民的參政、教育、居住、就業、就醫各層面，並開始參考國外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採行固定比例為僱用下限的優惠政策，保障原住民在公營機構的就業機會。原住民學生的受教育機會，也受到各級學校升學制度中的加分及獎助學金政策所保障。這些優惠措施配合原住民重要政策的變革，呼應著憲法明定保障少數民族的精神。

原住民優惠政策跟針對其他弱勢群體的優惠措施類似，目的在於協助弱勢者克服不利環境與所處困境，保障其生存及競爭的權利。以保障名額措施來確保競爭力，在其他弱勢團體不乏先例，在國外民主國家也行之有年。優惠政策對提升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不無助益，對原住民的生活與就業也有貢獻；如部分原住民菁英所言，若干原住民得以出人頭地，除了個人努力之外，也是拜教育優惠政策之助。就原住民成員來說，優惠政策似乎發揮了若干效應；對一般民眾而言，弱勢族群的優惠政策也符合人權需求和社會正義的原則。

族群優惠政策固然有其民意支持基礎，卻也有容易遭受到保留或質疑抗拒的一面。這種保留或抗拒，往往出現在以承襲身分作為判定優惠對象的政策上。質疑或抗拒的背景，或是基於個人應該為自身成就負責的工作理念，或源起於保守的意識型態，或是為了群體的利益衝突，或考慮到優惠政策容易引起依賴心，甚至是因為負面的刻板印象或族群偏見。原住民優惠政策引起的反彈，常出現在同樣弱勢的社會群體，或者同處偏遠地區、跟原住民有密切競爭關係的漢人身上。即使在原住民族

內部，優惠政策也偶爾引來警語，尤其是少數原住民質疑保障政策可能伴隨長期依賴傾向，損及民族自尊心，反而限制了長遠的競爭力。這些因素遍及不同層面，說明了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傾向，反映著錯綜複雜的社會心理與族群情結，成為研究原漢族群關係的一項重要議題。

本研究以這項社會心理與複雜情結作為出發點，分析漢人和原住民兩群成員分別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所持的立場。論述目的不在評估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實質內涵，也不是要判斷政策的效應或優劣，而是著眼於族群研究傳承中一項相當敏感的議題，探討強勢族群和弱勢族群本身的成員，如何看待針對弱勢族群而設的優惠政策。¹對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可以反映出若干隱而不顯的族群情結，進而揭示族群衝突的潛伏因素。這些因素對了解原漢關係有特殊貢獻。分析的資料由兩項最近的大型問卷調查收集而來，分別代表整個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人口。全文論述的理論架構依據，則參考族群研究文獻中有關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社會心理研究。

二、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反應²

在一九九〇年代各級政府成立原住民委員會或原住民行政局後，原住民優惠措施傾向以更明確的標準來執行。例如台北市政府已制定法規，

¹ 本研究以「強勢族群」取代一般通用的「優勢族群」，來跟「弱勢族群」相對稱，是為更加釐清majority（多數、強勢、優勢）相對於minority（少數、弱勢、劣勢）在語意上的確實含意，彰顯出客觀情勢上漢人族群在台灣社會的「多數與強勢」地位，而避免將「優、劣」之分帶入族群位階的主觀判斷。作者謹此感謝原住民知識份子提醒應該在這種用詞上釐清語意。

規定市政府公務機構內的臨時約僱人員當中，至少要保留百分之二的名額錄用原住民。另外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國內員工逾一百人的得標廠商，應該在履約期間保留百分之二的名額僱用殘障人士及原住民；若干重大工程也必須保留百分之二提供原住民承包。這些新措施更明確地保障原住民的工作權。³

保障原住民的就學權益一向是優惠政策的另一重點。近年來針對原住民學生的升學加分措施也愈加優惠，尤其是原住民國中畢業學生升高中的聯考分數從總分加 35 分，提升為總分加 20%；原住民學生從高中升專科以上學校仍舊得以加分 25%。加分結果，造成極少數表現特殊的原住民考生榮登榜首，引發有關加分制度的爭議。

爭議的一方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例如東部的漢人明顯地對原住民比較不友善（傅仰止 1994a），東部若干中學的漢人學生也特別在意「只要是原住民，就可以加不少分」（張世佩 1994）。比較婉轉的說法，是擔心「盲目補助原住民學生，讓漢人難以提升對原住民學生的尊重，覺得他們是靠政府施捨長大的」；或者是不贊成原住民學生「一律」加分，而必須區分個人的生長背景或階層是不是真的有「山地經驗」，避免「漢化的原住民或都市原住民」從中得到不當的優惠，讓漢人認為政府對原住民的輔助過於優渥。甚至有少數人認為「政府對原住民的照顧，超出其他族群人士…。由政府照顧原住民的優厚政策看來，原住民應該

² 本段僅回顧原住民優惠政策所引起的反應，實際的政策演變與大事記請參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收藏或頒佈的相關法令，以及山海文化雜誌整理的「歷年來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重要政策一覽表」（山海文化雙月刊 1999）。原住民優惠政策制訂的演變及歷史背景則請參閱孫大川（2000）。

³ 參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的「原住民權益手冊」（2000a）、「政府採購法與原住民權益」（2000b）等。

不再是弱勢族群」(務實 1998; 丹鳳 1996; 曾昭文 1999)。於是,居住在山地鄉的少數漢人自稱「弱勢中的弱勢」,組成「山地鄉平地人權益促進會」(平權會)來爭取漢人在山地鄉的權益。

爭議的另一方則認為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者的意見過於偏頗,甚至沒有考慮到政策的真正意涵。例如「原住民學生加分太多」的疑慮,可謂曲解了加分優惠政策的用意:由於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條件不如一般學生,加分制度是在彌補教育資源立足點的不平等,讓原住民學生有公平競爭的條件,絕非「優待」,也不是一種施捨或憐憫。即使經過加分,原住民學生的大學聯考錄取率還是遠低於一般水準(高揚昇 1998, 1999, 2000)。而「平權會」自稱處於山地鄉中的相對弱勢,實則不外乎受到財團主導,訴求參政權和土地權,對原住民形成「第二次壓迫」(瓦歷斯·貝林 1998; 歐蜜·偉浪 1997; 顧玉珍、張毓芬 1999)。

除了這些爭議之外,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確也引起其他值得深思的議題。例如若干優惠措施的美意容易遭到曲解,以至於地方政府規劃於短期內免房租提供國民住宅給部份都市原住民居住,長期下來卻必須採取法律行動來驅逐違約的原住民住戶。類似這種困境,教人構思除了治標式的實質優待之外,是不是還有什麼更重要或根本的政策方向可循,例如在教育、生活習性、社區文化的重建上再下功夫,提昇原住民的自信心(什米有·吉洛 1997);或者規劃包括土地、文化、經濟「整體」的原住民政策,朝向「反殖民」的民族自主方向,而不侷限於「補殘式」的社會福利政策,尤其應該大力維護原住民保留地的完整與自主性,建構真正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原鄉」(張茂桂等 1998; 張茂桂 2000)。

因此,以原住民如此特定族群為對象的優惠政策,除了有其錯綜複雜的歷史及政經糾結外,還有著相當複雜而異質的社會心理反應及背景。要深思檢討優惠政策,除了要剖析歷史演變、政經肇因外,另一重點在

於了解這種異質的社會心理背景。國內研究文獻中不乏探討原住民政策的演變，卻相當欠缺對這種社會心理作學術探究，亟需藉由有系統的架構及設計來收集大量實證資料，據以對相關背景作比較全面的剖析。本研究開始朝此方向努力，固然難有國內既有研究成果作基礎，卻能參考國外相關文獻中的理論觀點與主要論述。不論是支持或抗拒這種族群優惠政策，都不能訴諸單一的因素，而必須同時從社經地位、居住環境或族群接觸經驗、意識型態、族群意象或情感、對族群位階的認知、對弱勢族群困境的歸因這些因素來衡量。依據這些因素與相關背景，可以從既有的族群研究文獻中整理出重要而一致的研究議題與方向。

三、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社會心理背景回顧

依據國家社會福利的觀點而言，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立意是爲了彌補弱者在權益上的不利地位，有其必要性。一般民主國家的民眾大都支持優惠政策的「原則」，認爲在人權至高原則之下，應該保障弱勢族群的生存權；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個人成就自主的原則，由個人決定成敗，所以對特定的「實質優待辦法」又多半有所保留。這種兩難反映出「社會公平及集體責任」和「個人成就及工作倫理」兩端主流價值觀或意識型態互相制衡對抗，在民主國家中成爲尋求民意支持制定政策的一大挑戰。優惠政策固然不能一味由民意來引導，卻也不能忽略一般大眾的社會心理和反應；畢竟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走向有一部份是依民心而定。對這種社會心理加以剖析理解，應該是政策實施前後必備的工作（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1028-1029; Kuklinski et al. 1997:415-416）。

優惠政策「保障弱者」的原則，普遍獲得民主國家的民眾支持。但是一般人對優惠的對象則有不同意見，例如以殘障者爲保障對象的政策

比較沒有爭議，而以失業者作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則爭議較大（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針對特定族群作為優惠對象的政策，在某些國家地區也引起激烈討論，甚至幾乎成為族群衝突的導火線。‘這種「同意保障弱者」和「對優待特定對象有所保留」之間的矛盾，多少反映著對特定群體的位階有不同認知，也透露出若干族群間存在緊張關係。即使針對特定族群的優惠政策，也隨著「原則上照顧」和「實質上給予特別優待」，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民意支持。以美國的白人為例，同意政府額外照顧黑人的比例達到 59-61%，可是只有 23-26% 贊成特別針對黑人給予實質的優待（Kuklinski et al. 1997:411）。這種實質優待如果是採取「設定最低名額或比例予以保障」的方式，則受到支持的比例更低（16%）；將近一半民眾（47%）贊成不設最低保障名額或比例的優惠政策（Plous 1996）。

族群優惠政策是相當複雜的議題，政策的實質內容不是一般民眾容易理解。可是大部分民眾都能夠針對相關調查表達出明確立場，令人稱奇。依據調查研究的推理邏輯，一般人碰到政策之類的複雜議題，雖然無法立即下判斷或表達偏好，卻可以藉由對政策所涉及特定對象的情感，或者對相關問題的認知這些步驟加以間接推衍，帶引或啟發自己來判斷該不該支持針對特定群體的優惠政策。研究者也可以藉由當事人的社經背景、一般理念或意識型態，來分析其對政策所持立場。這些推論過程和相關背景，都成為文獻中剖析族群優惠政策相關社會心理背景的重要內涵（Steeh and Krysan 1996; Sniderman et al. 1986; Sniderman et al. 1991;

* 一般的族群優惠政策是針對人口佔少數、社經地位低弱的族群，僅有少數例外，例如馬來西亞的馬來人雖然在人口上佔多數，卻在若干領域上受到政策保障（Lim 1985）。



Kluegel and Smith 1983)。

相關研究多半將社經地位當作基本項目，用來探討民眾對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有什麼差異。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處於弱勢者，通常比較支持社會福利政策或原則 (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可是強勢族群當中社經地位較低的成員，反而容易爲了位階相近或利益衝突等因素，偏向抗拒弱勢族群的優惠政策。社經地位較高的強勢族群成員(尤其是高教育程度者)則容易基於同情心，或基於道義及社會正義原則，或基於意識型態、社會期許等因素，傾向支持給予弱勢族群種種優惠 (Quillian 1996; Jackman 1973; Jackman and Muha 1984)。這種教育程度的正面效應，甚至隨著世代而益趨彰顯。

以特定弱勢族群爲對象的優惠政策，通常會受到其他弱勢族群的排斥。這種現象在不同弱勢族群的地位相當時，尤其明顯。如果族群間同處於弱勢，即使弱勢的程度不同、歷史背景不一，特定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形成條件，未必適用於其他弱勢族群，未受到優惠的其他弱勢族群還是會訴諸社會公平原則，抗拒這種特定族群對象的優惠政策 (Allport 1979; Bobo and Hutchings 1996; Blumer and Duster 1980)。

整體而言，現階段的台灣漢人族群固然相對於原住民是強勢族群，內部卻又隨著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外省之分，在主客觀的族群位階上有明顯區別。依據最近幾年在全台灣地區進行的大型抽樣調查結果，除了閩南人是多數族群外，客家人大約佔台灣人口的 10-15%，外省人的比例也在 12-15% 之間，顯然都是人口上的少數族群 (章英華主編 2000：90，226；章英華、傅仰止主編 2000：73，164)。可是這兩個族群在台灣社會的位階卻不盡相同。不論就政治勢力和財富地位而言，客家人都是漢人族群中的弱勢；再從平均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個人收入來比較，客家人也不如閩南人和外省人。這種弱勢地位可以從主客觀依據明顯反

映。反之，外省人則在漢人族群中處於相對強勢，跟閩南人在不同面向上分別佔著有利地位。⁵這些處於不同族群位階的漢人群體，如何看待原住民，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程度又有什麼差異，都成為理解台灣族群關係的重要議題。

依據大型的問卷調查結果，處於政經弱勢的客家人，從對原住民的困境歸因解釋當中，多少透露出不同情原住民的傾向；相對而言，外省人對原住民的意象則緩和得多，至少不會那麼負面（傅仰止 1994b，1994c）。再根據原住民村莊內的長期參與觀察與訪問結果，也可以從原住民對不同漢人族群的主觀評價，看出各種原漢關係的端倪。例如阿美族青少年對客家人的印象不太好，談到客家人時，會偏向「直接指出比較不喜歡」，對外省人則偏向正面，會「指出比較喜歡或覺得比較好」（許木柱 1987：117）。如此從大型問卷調查或小規模田野觀察所得，都顯示出客家人和外省人雖然都和原住民同屬少數族群，兩者和原住民之間卻有著不盡相同的族群關係。這種差異是否也反映在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上，將是本文分析另一重點。

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也很可能隨著當事人和該特定族群成員接觸的經驗而異。由於族群接觸的類別形形色色，各種互動的深淺不一，對族群態度或政策立場的效應也就各異其趣（Allport 1979：262-263）。如果族群接觸是基於親近的朋友關係，或者較密切的鄰里來往，則互動的雙方偏向抱持較為正向的族群態度，也不容易感受到族群間的敵意（Sigelman and Welch 1993）。但是就大區域內浮面的互動來說，族群接觸反而容易讓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有所戒心：在弱勢族群人口比例愈高的區域或國家，強勢族群愈覺得受到威脅。例如美國南方的白人傾向反對

⁵ 詳細差距及數據參閱傅仰止（1995）、王甫昌主編（2000）等文獻。



以黑人為受惠對象的優惠政策，弱勢族群多的歐洲國家民眾有較明顯的族群偏見（Quillian 1995, 1996）。

相對而言，在原住民人口比例佔將近十分之三的台灣東部，漢人對原住民也比較不友善。這種對原住民的不友善現象，不但可以從大型調查中的漢人樣本來驗證（傅仰止 1994a, 1994b, 1994c, 1996），也可以透過較小規模的原住民訪問結果來加以理解。例如花蓮地區的原住民大學生，對自己族群所受到漢人所加諸的「污名化」感受特別深刻，也難以釋懷當地漢人對原住民的負面意象及態度（謝世忠 1987：32-36）。弱勢族群在族群混居明顯的地區受到較深敵意，固然是因為弱勢族群的人口比例較高而引起威脅感、族群接觸多半偏向浮面，也是因為各族群容易在這些地區爭奪群體利益，或者地區的從眾傾向強烈、容忍程度較低所導致（Bobo 1998；Bobo and Hutchings 1996；Sniderman et al. 1993；Abrahamson and Carter 1986）。相形之下，大都會地區的異質人口與文化孕育了容忍異端的氛圍，提供對弱勢族群優惠政策較為友善的環境（Tuch 1987；Wilson 1991）。

一般民眾對族群優惠政策抱持何種立場，除了因社經背景和接觸經驗而異外，還同時隨著相關的態度而起變化。這些態度大致分為一般的意識型態或認知、針對特定族群的種種看法兩大類。以一般的意識型態為例，認同社會民主價值的群體成員，通常比較支持社會福利政策或原則（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而政治上比較保守、階層意識較強、或者感受到社會制度或階層分化對自己或自己所屬的群體不公平者，則傾向反對族群優惠政策（Bobo and Hutchings 1996；Hughes and Tuch 2000；Sniderman et al. 1991；Dillion 1999）。最近另有研究根據大型問卷調查結果進一步追蹤訪問，發現意識型態開放的強勢族群成員，跟保守的成員一樣反對族群優惠政策（Gilens et al. 1998）；因此，從一般的

意識型態來推論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到底有多少效力？其間效應在台灣的原漢族群之間又存在什麼差異？應該是剖析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的另一重要議題。

再從針對特定族群的看法來分析，對特定族群的一般態度、所抱持的族群意象或刻板印象、對族群成員的主觀感受或情感、對族群位階的認知、對族群困境的歸因解釋等等，都是了解族群優惠政策立場的重要背景。依據過去研究發現，如果對特定族群抱持負面態度或刻板印象、在情感上有明顯距離，則不容易支持針對該族群而設的優惠政策；反之，正面的族群意象，或者比較親近的感受，都有助於認同這類優惠政策。這種關聯，經過族群意象和社會距離的測量檢驗，都得到正向的結果（Bobo and Hutchings 1996; Sniderman et al. 1991）。至於一般民眾如何在社會化過程中融入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或族群意象，又如何發展出和特定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則是了解族群態度和立場背景的進一步議題。最近研究發現，對弱勢族群的種種正面意象和負面意象之間密切相關，正面意象上升，則負面意象下降；因此，針對不同領域所測得的正負意象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反映出族群意象的測量有其一致性（Levine et al. 1999）。

跟前述一般的社會或政治意識型態比起來，族群意象或情感對優惠政策立場能發生多大的效應？所運作的方向有何特色或限制？一般民眾並不熟悉複雜的族群優惠政策內容，卻都能表達出明確的立場，部份原因是有著意象、情感、或意識型態作為前引，將個人導向特定的立場。依據文獻上的詳細比較與分析，這種受到「情感或意象驅使」和受到「意識型態驅使」的政策支持力量各有千秋。低教育程度民眾對優惠政策的立場，比較容易受到情感的驅使；對特定族群有好印象、社會距離近，就偏向贊同給予特殊的待遇。反之，高教育程度者的立場，則比較依靠

意識型態的驅使：政治態度上愈開放、愈贊同社會公平原則者，對族群優惠政策也就愈認可（Sniderman et al. 1991：79-85）。換言之，優惠政策的內容固然複雜，民眾的立場還是可以依教育程度之區別來加以推衍。

在族群情感和意象之外，對特定族群處境的認知與判斷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不同族群之間的相對位階有客觀的依據可循，例如教育程度、職業地位、政治勢力、經濟和財富實力等。族群位階也可以另外藉由主觀的判定來加以排列。主觀排列的結果多半呼應客觀事實，但是族群位階主觀排列的判準又可以超越客觀數據，尤其是以經常用來判斷族群意象的幾項特質來評比（例如工作勤勞、語言優美等）。這種族群位階的主觀評價，是了解族群關係的重要背景。對特定族群給予歷史或集體式的判斷，不但能揭示各族群在社會中所佔的相對位階，也可以據以理解族群優惠政策的特定立場：愈能體會特定族群的弱勢位階者，通常也愈同情該族群、愈贊成在政策上給予優惠（Blumer 1958；Blumer and Duster 1980；Hraba et al. 1989；Bobo and Hutchings 1996:955；傅仰止 1995）。

對弱勢族群的困境作何解釋，又要比對弱勢位階的認知更有助於理解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弱勢族群困境有著錯綜複雜的肇因，其複雜程度遠非一般民眾可以理解。但是不同的人對這種困境有不同的歸因解釋。文獻上通常將不同的困境歸因大致分為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兩大類，前者指基於當事人本身的因素，後者指基於外在結構或環境、非當事人所能控制的因素。這種分類又可以稱為個人歸因與結構歸因，分別指涉歸咎於個人或歸咎於結構（Hewstone 1989）。

依據文獻上深入分析結果，抱持內在或個人歸因解釋的，通常比較不同情困境的當事人；採納外在或結構歸因解釋的，則較為同情（Kluegel 1990）。換成以對政策立場的支持與否來衡量，如果將族群不

平等歸因於內在或個人因素，則未必就明顯地反對族群優惠政策。換句話說，個人歸因對族群優惠政策並沒有很清楚的效應，可是只要對族群的困境以結構式歸因來解釋，就容易支持族群優惠政策。這項結構歸因對支持優惠政策立場的效應相當顯著，比其他因素所能發揮的解釋力（例如族群身分、人口社經背景、其他意識型態等），都要來得強而顯著（Sniderman et al. 1991；Hughes and Tuch 2000）。

對族群困境的個人歸因或結構歸因，並不是單一面向的兩極，強勢族群和弱勢族群都同時抱持這兩種歸因解釋。以美國社會為例，許多黑人同時從個人歸因和結構歸因來解釋自己族群的社經困境；白人的解釋也並不明顯偏向個人歸因或結構歸因，甚至兩項歸因可以並存（Sigelman and Welch 1991；Kluegel and Smith 1982）。再以台灣原住民的社經困境為目標，漢人和原住民一般都比較偏向抱持結構歸因解釋（傅仰止 1994b，1994c）。但是對那些在山地鄉工作的漢人基層行政人員來說，原住民的社經困境主要是因為「經濟觀念薄弱、自己不努力」這類個人內在因素；而原住民學生成績比較差，主要是因為「父母不注重子女教育、學生自己不用功」等（李亦園等 1983：212-214）。原住民群體對自身困境的歸因解釋，則顯現不出明顯的變異，只有社經地位（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原住民，很明顯地認為多數原住民的困境是由於自己不努力所引起（傅仰止 1994c）。依前述實證研究經驗，一般漢人和原住民應該多半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而部份特質的人（例如鄰近原住民原居鄉的漢人、社經地位較高的原住民等）則可能偏向抗拒這種政策。

由於強勢族群和弱勢族群對族群位階的立場不盡一致，甚至南轅北轍，實證研究者應該同時分析強勢族群成員和弱勢族群成員的立場和觀點。許多族群研究限於探索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態度，未能兼顧弱勢族群本身的族群態度。研究者或受限於樣本收集不易，或假設弱勢族群

成員的觀點之間沒有明顯變異，而難免有所偏頗。這項限制已逐漸受到重視，例如少數研究追蹤美國白人和黑人二十多年來的族群態度，發現兩者多年來對族群優惠政策的支持比例沒有什麼改變：白人的支持率接近 20%，黑人則接近 40%（Steeh and Krysan 1996），清楚揭示出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的立場有明顯差距。又例如一般以為族群間的接觸可以導向正向的族群態度，可是許多族群接觸是在公共場所不友善的情境下進行，對接觸雙方而言，這種接觸都不容易帶來正向的態度或關係（Allport 1979；Feagin 1991）。近年研究也強調同樣的族群接觸經驗，對分屬不同位階的強勢族群和弱勢族群，通常會產生不同的效應。同樣是強勢族群或同樣是弱勢族群的成員，又會隨著種種因素而有內部變異。弱勢族群成員固然需要顧及我群的利益、形象、自尊，卻也不乏對我群中的其他成員加以否定，或者不願認同自己的族群（Allport 1979：150-153；Bobo 1998；Powers and Ellison 1995；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這種不同族群之間在族群優惠政策立場上的差異，以及各族群內部成員本身的變異，將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所在。

四、研究資料與變項測量

本研究運用兩筆最近的大型問卷調查資料，分別分析漢人和原住民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漢人的資料是依據「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以下簡稱「族群調查」）。該調查在全台灣各地進行面訪，調查期間從 1999 年 8 月到 9 月，本研究所分析的漢人有效樣本數為 3349。⁶ 原住民資料依據「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在 2000 年 7 月和 9 月分次進行的「原住民專題調查」（以下簡稱「原住民調查」），本研究所分析的樣本數為 807，全數是原住民（參見表 1）。⁷

表1 贊成原住民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照顧的民意演變 (%)

調查年	漢人		原住民		調查計畫名稱
	%	N	%	N	
1991	26.3	1569	58.3	36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
1992	—	—	86.1	367	都市原住民追蹤調查
1994	68.5	1383	81.3	48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
1999	58.1	3349	90.2	122	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
2000	—	—	89.0	807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原住民專題調查

註：(1) 表中百分比是以不同程度正向答案的總和來計算；

(2) 1991年調查問項用詞採用「應不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的優待」，
1992年調查問項用詞採用「應不應該得到政府更好的照顧」，
其他三次用詞均為「應不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

表1列出歷年不同調查結果。比較這些結果，發現問項的用詞不同，訪問的結果也差別很大：只有四分之一的漢人贊成政府特別「優待」原住民，但是贊成特別「照顧」原住民的漢人則有六、七成。同樣的，贊成「特別優待」的原住民不到六成，贊成「特別照顧」的則高達八、九

。『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是行政院國科會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88-2412-H-001-012），由王甫昌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依據戶籍資料採分層抽樣進行面對面訪問；實際調查訪問委託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進行（王甫昌主編 2000）。整個調查資料檔的總樣本數是 3496，其中原住民只有 122 位，由於數目過小，不納入本文分析。本文分析的樣本僅限於有效回答依變項的 3349 位漢人。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規劃式集體研究計畫，由伊慶春教授主持；『原住民專題調查』的實際電話訪問委託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執行，抽樣母體是過去一年內透過該中心電話訪問到的全台灣兩千四百多位原住民（伊慶春、傅仰止主編 2000；傅仰止等 2001）。依據 1997 年底的家戶調查結果，台灣原住民家戶中有電話的比例為 88.8%（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998：157），估計在本次專題調查時這項普及率應該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高普及率可以顯示電話調查的對象的確可以涵蓋到絕大多數的原住民人口，其代表性不下於依據戶籍資料作面對面訪問。

成。比較 1994 年和 1999 年兩次調查結果，漢人贊成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的比例降低約十個百分點，原住民贊成的比例則上升約九個百分點。從短短幾年間的比較，顯示原住民優惠政策在漢人當中的支持減弱，在原住民之間則更加普遍。由於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在各次調查中使用的問項字句不完全相同（詳見表 1 註），無法合併分析。而 1994 年的社會意向調查採取膨脹樣本的抽樣法，各漢人族群樣本分佈跟母體人口分佈差別較大，所以也不加入 1999 年的樣本分析。此外，各次大型調查所收集到的原住民樣本數都很小，難以作複雜分析，原住民部份的分析也只利用 2000 年的調查資料。

（一）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認可，實際問項是「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應不應該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答項包括「很應該、應該、還算應該、不太應該、不應該、很不應該」六項，另外有「不知道或無意見」。問項和答項內容在族群調查和原住民調查中完全相同。如前述，「特別照顧」有別於「特別優待」，比較偏向測試支持優惠政策的抽象原則，而非實際內容。表 1 列出的是兩次調查結果中贊同的比例之和，表 2A 和表 2B 的第一列則分別列出兩個樣本的平均數和標準差等。漢人答案的平均數接近 4「還算應該」，原住民的則略高於 5「應該」；原住民樣本的標準差小於漢人的標準差，也顯示原住民的意見相對地比較一致。由於依變項的答項屬性是等第尺度，下文分析時採用等第波比（ordered probit）分析。



表2 分析變項摘要

A. 漢人樣本 (1999年調查, n=3349)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支持優惠政策	3.911	1.28	1	6
性別				
男	.502	.50	0	1
女	.498	.50	0	1
年齡	41.183	13.27	20	74
婚姻狀況				
已婚	.748	.43	0	1
未婚及其他	.252	.42	0	1
教育程度 (組)	2.661	1.16	1	4
個人收入 (組)	3.017	1.64	1	8
族群別				
本省閩南	.732	.44	0	1
本省客家	.100	.30	0	1
外省	.133	.34	0	1
15歲後接觸原住民	2.015	1.01	1	4
現居地都市化程度				
鄉村	.212	.41	0	1
城鎮	.548	.49	0	1
核心都市	.238	.42	0	1
區域				
北部	.432	.49	0	1
中部	.149	.35	0	1
南部	.354	.48	0	1
東部	.063	.24	0	1
社會公平	3.053	.86	1	5
多付稅	2.532	.59	1	4
教方言	3.247	.58	1	4
語言優美	4.830	1.83	1	10
愛國	7.507	1.82	1	10
勤勞	4.958	1.80	1	10
社會距離	2.894	1.05	1	5
政治勢力	3.514	1.51	1	10
財富地位	3.783	1.41	1	10
自己不努力	2.103	.90	1	3
社會不公平	1.909	.89	1	3



表2 分析變項摘要 (續)

B. 原住民樣本 (2000年調查, n=807)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支持優惠政策	5.096	.96	1	6
性別				
男	.448	.50	0	1
女	.552	.50	0	1
年齡	38.810	9.74	20	60
婚姻狀況				
已婚	.823	.38	0	1
未婚及其他	.177	.38	0	1
教育程度 (組)	2.050	1.02	1	4
個人收入 (組)	3.298	1.75	1	6
現居地都市化程度				
鄉村	.626	.48	0	1
都市	.374	.48	0	1
接觸型態				
散佈	.242	.43	0	1
叢結	.332	.47	0	1
聚合	.426	.49	0	1
社會公平	2.625	1.11	1	5
勤勞	5.824	1.85	1	10
社會距離	1.891	.89	1	5
財富地位	4.089	1.65	1	10
自己不努力	2.134	.96	1	3
社會不公平	2.527	.80	1	3



(二) 自變項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內容，本研究分析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如何隨著下列幾類因素而異：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族群別、接觸原住民的經驗、居住環境、對社會公平的感受和一般意識型態、對原住民的族群意象和社會距離、對原住民族群位階的認知、對原住民社經困境的歸因解釋等。由於原住民調查採電訪方式進行，內容長度不及族群調查，所以有若干變項從缺；但是有關原住民跟族群內部成員接觸經驗的變項則較為完整，足以建構新的變項，是有別於漢人樣本的一項重要特色。

基本人口特徵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三項，其中性別和婚姻狀況兩項分別建構虛擬變項，分別由男性（對照組是女性）和已婚者（對照組是未婚和其他）代表。族群調查的樣本年齡從 20 到 74 歲，原住民調查則考慮到訪員跟年老原住民之間的語言溝通問題，樣本年齡上限定為 60 歲。社經地位由教育程度和個人收入這兩項變項代表。教育程度包括國小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專科以上 4 組；個人收入的答項在族群調查中分為 8 組，在原住民調查中本來有 14 組，分析時簡化為 6 組。族群別分為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外省 3 組，分析時以最多數的閩南人作為對照組。

原住民接觸經驗在兩次調查中所用的指標不同。族群調查採用「15 歲以後接觸原住民」的頻率作為指標，選項從「從來沒有」到「經常」，共四項。原住民調查則將兩項變項交叉。第一項是住處附近的原住民戶數，選項分 0 戶、1-5 戶、6-29 戶、30 戶以上；第二項是日常生活接觸對象中的原住民比例，選項從「幾乎都不是原住民」、「大部份不是原住民」、「大概一半一半」、「大部份是原住民」到「幾乎都是原住民」，共五項。依據長期主管原住民業務之政府機構所用的標準，通常將原住民戶數在 30 戶以上的地區視為原住民聚居地。住處附近有

30 戶以上的原住民，的確代表跟原住民接觸的機會較大，可是未必涵蓋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際接觸層面。第二項變項可以綜合所有日常生活層面的接觸，測量出「跟原住民接觸」在受訪者一般人際來往中所佔的比重。本研究以兩變項交叉表中部（表 3A）的右下角三格（C5, D4, D5）代表跟其他原住民有密集接觸的「聚合」（enclosed）原住民，以左上角六格代表跟其他原住民很少有接觸的「散佈」（scattered）原住民（指散佈在漢人當中），中間其他的組合則代表「叢結」式（clustered）的原住民（參閱 Fu 2000）。在 774 位有效回答兩項變項的原住民受訪者當

表3 原住民族群聚合綜合指標

A. 鄰近原住民住戶與日常生活接觸的原住民比例

日常生活接觸中的 原住民比例	附近的原住民住戶				N	%
	0 (A)	1-5 (B)	6-29 (C)	30+ (D)		
(1)幾乎都不是原住民	43	47	22	19	131	16.9
(2)大部份不是原住民	27	42	28	27	124	16.0
(3)大概一半一半	6	15	25	57	103	13.3
(4)大部份是原住民	5	22	38	119	184	23.8
(5)幾乎都是原住民	5	16	33	178	232	30.0
N	86	142	146	400	774	
%	11.1	18.3	18.9	51.7		100.0

B. 族群聚合的程度

聚合程度	表 3A 中的對應格			N	%
散 佈	A1-A3	B1-B2	C1	187	24.2
叢 結	A4-A5	B3-B5	C2-C4	257	33.2
聚 合	C5	D4-D5		330	42.6
合 計				774	100.0

來源：譯自 Fu 2000, Table 2.



中，有四分之一劃為散佈類型、三分之一是叢結類型、四成多屬聚合型（表 3B）。分析時將以散佈型作為對照組，檢驗其他兩型的副樣本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有何特殊立場。

漢人和原住民兩筆樣本都依現居地的都市化程度加以分類，其中漢人樣本分為鄉村（對照組）、城鎮、核心都市三類，原住民樣本屬於核心都市的比例過低，則和城鎮合併為「都市」。⁸原住民當中的都市樣本佔 37.4%，合理反映出原住民人口大量往都市地區移居的事實。漢人樣本另外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區，以檢驗過去研究所強調的區域效應。

在社會公平感受和其他意識型態項目中，「社會公平」指涉當事人對「生活水準和努力比起來」感受到公平與否（分五選項）。「多付稅」指願不願意繳更多稅去照顧貧窮的家庭；「教方言」則指是否贊成除了國語之外，另外在小學教方言。後兩項在原住民調查中從缺。

「社會距離」在兩次調查中也以完全相同的問項施測：受訪者如果有女兒要和原住民結婚，心裡願不願意。選項包括「非常願意」、「願意」、「還算願意」、「不願意」、「非常不願意」，共五項。分數愈高代表愈不願意，也就是跟原住民的社會距離愈遠。漢人樣本的平均數將近 3（還算願意），原住民的平均數接近 2（願意），兩者有明顯的差距。

對原住民的族群意象和位階認知當中，「語言優美」、「愛國」、「勤勞」都是依照從 1 到 10 分的主觀評估分數計算；「政治勢力」和

⁸ 都市化程度的劃分是依據多項人口與社經指標綜合製作而成（李朝賢 1990，洪永泰 1992：3）。劃分辦法將全台灣的鄉鎮市分為八個都市化等級後，再簡化為核心都市、城鎮、鄉村三級。其中核心都市指台北、高雄、台中三大都會區的中心大都市，「市鎮」包括其他四個省轄市（基隆、新竹、嘉義、台南）以及上述分類中的第四、第五級鄉鎮市，「鄉村」則指第六到第八級，都市化程度最低的鄉鎮。

「財富地位」也是由受訪者從 1 到 10 自行評分，分數愈高代表評價愈正面。漢人對原住民族群意象和族群位階的主觀評分，除了愛國一項較高外，其他都偏低；原住民對我群財富地位的評價也低，對勤勞的評分則比漢人所評的要高，大致跟五年前的結果相符（傅仰止 1995）。至於對原住民社經困境的歸因解釋，漢人和原住民對「自己不努力」的反應大致相同，而原住民贊同「社會不公平」說法的比例則比漢人偏高。⁹這些族群意象、位階認知、困境歸因都大致反映著對原住民族群的態度和評價，有助於理解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是依什麼背景而異。

五、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的背景分析

從簡單相關係數來了解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所持立場，可以初步得到若干背景訊息。所有的意識型態都和正面的政策立場相關：愈感受到自己受到社會公平待遇、愈願意多付稅來照顧貧窮家庭、愈贊同在小學教方言的漢人，也愈偏向贊成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表 4A）。族群意象和政策立場也呈現明顯的正面相關：認為原住民的語言優美、認為原住民工作勤勞的漢人，也愈贊同優惠政策；只有對「愛國」意象的評價和政策立場幾乎無關。

漢人所表達出來跟原住民之間的社會距離，也和優惠政策的立場沒有顯著相關。但是從對原住民族群位階的主觀評估，則可以清楚看出優惠政策立場的意涵：認為原住民的政治勢力薄弱、財富地位低微者，都

⁹ 社經困境的歸因解釋由下列題組測試：「一般說來，大部份原住民在社會上的地位都比較差，您認為是不是下面這些原因造成的？」子題分為「因為大部份原住民自己不努力」和「因為大部份原住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答項包括「是、不是、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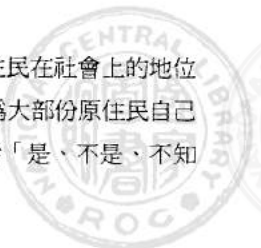


表 4 部份分析變項相關係數

A. 漢人

* $p < .05$

變項名稱	優惠	接觸	公平	付稅	方言	語言	愛國	勤勞	距離	政治	財富	不努力
15 歲後接觸	-.05*											
社會公平	.06*	.05*										
多付稅	.10*	.04*	.23*									
教方言	.10*	.03*	.00	.04*								
語言優美	.09*	.07*	.03*	.07*	.09*							
愛國	.02	.02	-.01	.00	.03	.14*						
勤勞	.07*	.02	-.00	.04*	-.02	.14*	.19*					
社會距離	.02	-.15*	-.01	-.08*	-.04*	-.16*	-.13*	-.15*				
政治勢力	-.06*	.03	-.01	.03	-.08*	.05*	.12*	.32*	-.09*			
財富地位	-.11*	.06*	-.00	.03*	-.07*	-.08*	.10*	.32*	-.15*	.50*		
自己不努力	-.24*	.00	-.00	-.04*	-.04*	-.08*	-.07*	-.28*	.12*	-.02	-.04*	
社會不公平	.30*	-.02	-.00	.05*	.08*	.05*	.00	.09*	.02	-.08*	-.09*	-.18*

B. 原住民

變項名稱	優惠	團結	聚合	公平	距離	勤勞	財富	不努力
接觸型態								
團結	.02							
聚合	.10*	-.60*						
社會公平	-.07*	-.01	.03					
社會距離	-.02	-.01	.14*	.00				
勤勞	.09*	.02	.07*	.03	-.09*			
財富地位	-.04	.03	.02	.12*	-.07*	.27*		
自己不努力	-.08*	.03	-.05	.17*	.01	-.16*	.04	
社會不公平	.15*	.00	.07*	-.16*	-.06	.06	-.04	-.11*

* $p < .05$

很明顯地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反之，認為原住民的政治勢力和財富地位都還不錯的，則反對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對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和政策立場的關聯更強。贊同「個人不努力」歸因的，顯然也不贊同原住民優惠政策；持「社會不公平」觀點的，則贊成這種政策。

表 4 所列出的簡單相關係數只展現兩變項之間的關聯，未考慮其他

相關因素的作用。將同樣變項一併列入分析，得到的結果略有變化。

以漢人的社經地位來判斷，並無法從個人收入的多寡來區辨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但是從教育程度卻可以清楚看出支持或抗拒的傾向。在同時考慮人口特徵、族群身分、接觸原住民的經驗、居住地、以及一

表 5 漢人支持或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背景分析：
社經地位、居住環境、與一般意識型態

(等第波比係數)

自變項	(1)	(2)	(3)	(4)	(5)
男性 (女性)	.042	.059	.067	.058	.058
年齡	.002	.002	.001	.002	.001
已婚 (未婚及其他)	-.082	-.081	-.070	-.085	-.071
教育程度 (1-4)	.126***	.128***	.111***	.116***	.091***
個人收入 (1-8)	.011	.015	.009	.011	.007
族群別 (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	-.128*	-.118	-.098	-.065	-.060
外省	.225***	.229***	.225***	.252***	.281***
15 歲後接觸原住民		-.061**	-.053**	-.020	-.027
居住地都市化 (鄉村)					
城鎮			.032	-.026	-.022
核心都市			.205**	.119	.111
居住區域 (南部)					
北部				-.012	-.039
中部				.019	-.004
東部				-.631***	-.677***
一般意識型態					
社會公平					.037
多付稅					.192***
教方言					.177***
擬 R 平方	.010	.011	.013	.018	.025
樣本數	3030	3014	3014	3014	30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各虛擬變項的對照組都列在變項名稱右邊的括弧內，以下各表皆同。

般的意識型態時，這項教育程度的正面效應都一直保持高度顯著：漢人的教育程度每升高一級，支持優惠政策的波比係數也隨著升高 .091，升高的幅度相當顯著（ $p < .001$ ，表 5 行 5）。受到較多學校教育的漢人，顯然明白表達出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意願。這種教育的效應呼應了前述文獻上有關教育程度的分析結果，例如教育有助於對福利政策的接納，也讓族群間有更多交往和互相了解的機會。但是教育效應也有可能是透過社會正義、保障弱勢的理念而產生，或者藉由道德規範的展示來發揮，展現出學校教育的不同功能。

依族群身分來分析漢人樣本，發現本省客家人和外省人（指父親的籍貫是大陸各省市者）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有明顯差異。以本省閩南人為對照組，客家人似乎比較抗拒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 $p < .05$ ，表 5 行 1），可是一併考量接觸原住民的經驗後，閩客之間的差異不再顯著。由不同分析模型之間的這種變化，可以歸納出客家人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是由於平常接觸原住民的機會較多；是這種族群接觸經驗帶來抗拒的立場，而不是客家身分本身（行 2）。¹⁰ 外省人的情形則大為不同：在基本人口特徵和社經地位相當的前提下，外省人要比閩南人明顯地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其間差異相當顯著，即使加入其他主客觀背景一併分析，外省人這種支持的傾向也都絲毫不減。因此，外省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高度支持，並不能歸因於外省族群在人口組成、社經地位、接觸原住民的經驗、現居地分佈、或者一般意識型態這些面向上有什麼特色。跟本省閩客兩群比起來，外省人支持原住民的傾向，成為相當特殊的現象。

¹⁰ 客家樣本當中，有 18.2%經常和原住民接觸，明顯高於閩南人當中經常接觸原住民的比例（10.5%）；外省人經常接觸原住民的比例則居中（14.5%，三個族群間的差異顯著）。



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接觸經驗如何，跟漢人的政策立場有明顯關聯，但是這種關聯隨著區域的效應而消失。從表 5 的行 2 和行 3 來看，在 15 歲以後較常和原住民接觸的漢人，不但不支持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反而明顯地反對這種照顧原則 ($p < .01$)。可是一旦加入居住區域來一併分析，原有的「個人族群接觸經驗」效應不再顯著。新加入分析的區域變項，則出現高度顯著的效應：東部漢人很清楚地比其他區域的漢人不贊同政府給予原住民特別照顧。不論個人的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族群別、跟原住民的接觸經驗、城鄉背景如何、甚至所抱持的一般意識型態是保守還是開放、覺得社會對自己公不公平、小學裡應不應該教方言，只要是住在東部的漢人，就是比其他地方的漢人反對原住民優惠政策。單單加入「東部」這個虛擬變項，就能將政策立場的等級評價拉低將近半個標準差左右，產生相當強烈而負面的區域效應 ($p < .001$ ，行 4)。¹¹

對照上述原住民接觸經驗的效應，可以說個人族群接觸經驗上的效應有一部份是由於區域效應所導致，一旦同時考量東部漢人所帶來的強烈效應，這種接觸經驗不再發生作用。換言之，漢人接觸原住民的經驗會帶來負面效應，實際上多半是由於東部漢人的特殊反應所引起。由於原住民在東部佔人口比例高達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東部漢人平常跟原住民接觸的機會要比其他區域的漢人明顯多得多。如果從各個區域內部再來檢視原住民接觸經驗，則發現對政策立場並沒有什麼影響。同樣是住在東部的漢人，都會比別的漢人反對原住民優惠政策；至於個人跟原住民之間有多少接觸，反而變得不重要。

居住地的其他指標對政策立場也有影響，但是影響幅度不如區域效

¹¹ 如表 2A 所列，漢人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平均數為 3.911，標準差為 1.28。

應。如果不考慮區域，跟鄉村居民比起來，核心都市的漢人比較贊同給予原住民特別照顧 ($p < .01$ ，行 3)。但是加入居住區域同時考量後，都市效應不再顯著 (行 4)。都市環境帶來的容忍效應，雖然適用在對於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上，可是這種效應跟上述族群接觸效應近似，多半是透過區域效應而產生作用。也就是在東部效應的強烈制約下，都市化背景和族群接觸經驗都不再是了解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的關鍵所在。

在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接觸經驗、居住地都相當的情況下，對社會的公平感受不呈現顯著效應。上述表 4 所顯示公平感和政策立場的相關，應該是基於教育程度和居住區域這些背景因素，而不是公平感本身的作用。其他兩項意識型態的效應則仍然相當顯著：不論個人背景如何，凡是願意多付稅來幫助窮人，或者贊同在小學教方言的漢人，都非常明顯地贊成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 (行 5)。如文獻所強調，強勢族群成員對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固然有其複雜的背景，還是可以從對其他社會議題的觀點來加以推測理解。

以表 5 所列自變項為基礎，再加入以原住民為特定對象的其他感受及評價一併分析，可以發現原有的效應變化不大。表 6 加進對原住民的族群意象、社會距離、族群位階認知、困境歸因解釋等項後，原有的教育效應依舊相當顯著：不論其他背景如何，不論對其他社會議題的看法有何差異，也不論對原住民有什麼樣的意象、情感、認知、歸因解釋，只要受過的學校教育愈多，就愈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

原有的族群別效應，也不隨著這些特定的原住民意象或認知而減弱。外省人特別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既不受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接觸原住民的經驗、居住地、一般意識型態這些因素所影響，也獨立於對原住民的意象和認知這些主觀判斷之外。換言之，不論個人認知中的原住民語言優美與否、是否愛國、有多勤勞、政治勢力與財富地位

如何，不論個人情感上感覺跟原住民多親近，也不論個人如何解釋一般原住民為何處於社經困境，只要是身為外省人，就會很明顯地更加支持原住民的優惠政策。

這項發現呼應文獻記載：客家人和外省人同為少數族群，對原住民的政策立場或同情態度卻不盡相同。外省人對原住民比較支持、同情，到底是基於前述族群位階背景，或者由於處境相近的同理心所導致，還是另有特殊的歷史結構因素？依據族群位階論述，外省人在政治經濟層面上未必是弱者，跟原住民之間也就比較沒有直接立即的潛在衝突可能、不容易感受到原住民受到政府特別照顧後會帶來什麼威脅，因而不大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

但是這種族群位階的解釋，是否能夠讓人確實理解外省人的獨特立場？前述族群之間的「高低位階」，又如何能充分反映出特定族群在特定社會中的獨特「處境」？回顧半個多世紀來的發展，外省人在台灣社會的歷史結構處境相當特殊，例如長期在政治、語言、教育等層面上佔有優勢，卻因為是後來者，在土地擁有、家產繼承等面向上又比較不利。這些結構背景所牽涉的因素錯綜複雜，更延伸影響到族群互動或族群意象等面向，因此，本研究揭示不同漢人族群對原住民政策立場上有其異質性，其間意涵及背景原因等，都值得依據不同的理論背景與實證資料，從類似族群位階、同理心、歷史結構背景等不同假設予以深究。¹²

區域效應也是同樣持續顯著：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劇烈抗

¹² 本文初稿僅強調族群位階的解釋，完稿則先後參照評審人及編輯委員所提：外省人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傾向，也可能是基於同理心或親和感。這種同理心或親和感對族群互動和族群意象的形塑作用，都跟族群位階的作用大異其趣。由於本研究所引實證資料及所作分析不足以充分驗證族群位階論述，所以僅將「族群位階」視為假設之一，也將其他論述當作同樣待驗證的可能假設。作者感謝評審之一提議「同理心」概念，也感謝編輯委員之一提議「親和感」、「土地擁有」等概念。

表 6 漢人支持或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背景分析：族群評價

	(等第波比係數)			
自變項	(1)	(2)	(3)	(4)
男性 (女性)	.055	.063	.049	.062
年齡	.001	.001	.001	.004
已婚 (未婚及其他)	-.059	-.071	-.081	-.045
教育程度 (1-4)	.093***	.089***	.075**	.069**
個人收入 (1-8)	.010	.010	.010	.022
族群別 (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	-.071	-.075	-.071	-.073
外省	.283***	.285***	.279***	.276***
15 歲後接觸原住民	-.036	-.027	-.024	-.023
居住地都市化 (鄉村)				
城鎮	-.004	-.014	-.035	-.033
核心都市	.124	.115	.098	.079
居住區域 (南部)				
北部	-.053	-.052	-.052	-.034
中部	-.019	-.024	-.031	-.002
東部	-.680***	-.692***	-.631***	-.470***
一般意識型態				
社會公平	.037	.039	.041	.052*
多付稅	.181***	.190***	.196***	.173***
教方言	.169***	.171***	.160***	.129***
族群意象				
語言優美	.024*	.029**	.033**	.026*
愛國	.021	.025*	.026*	.021
勤勞	.031**	.034**	.059***	.015
族群情感				
社會距離		.058**	.050*	.056**
族群位階認知				
政治勢力			-.019	-.002
財富地位			-.081***	-.064***
困境歸因解釋				
自己不努力				-.213***
社會不公平				.306***
擬 R 平方	.027	.028	.032	.062
樣本數	2978	2977	2964	2962

* p < .05. ** p < .01. *** p < .001

拒，不是因為人口組成不同，不是由於社經地位特別，也不是對一般的社會議題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更不只是對原住民有特別的負面印象、有明顯的社會距離、或者對原住民的困境有不同的認知或解釋。即使有漢人同樣是對原住民的印象不好、社會距離遠、認為原住民的財富地位不低、其困境主因是自己不努力，這些漢人只要是住在東部，還是明顯地會比住在其他區域的漢人更反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既有研究強調東部的原住民人口比例較高、族群位階特殊、原漢族群對政經資源競爭較激烈，都是其他可能的結構背景因素（傅仰止 1994a, 1996）。本研究則揭示出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抗拒，其背景因素絕對不只上述這些特定的族群意象和評價。

有關其他社會議題的意識型態，仍然是了解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的有效指標。在一般意識型態上愈開放者，愈能接納優惠政策，其間關聯不受到對原住民的意象和評價所影響。再看族群意象本身，結果仍然呼應文獻上記載的研究發現：正面的族群意象是支持族群優惠政策的有力背景，負面的刻板印象則不利於對政策的立場。如表 6 所列，相同背景的漢人當中，認為原住民語言優美的，顯然就在政策上比較支持原住民；認為原住民勤勞的，也贊同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不過前項語言意象的效應相當獨立，有關勤勞意象的效應則在同時考慮困境歸因解釋後，不再顯著。換言之，勤勞意象的效應是藉由困境歸因才得以展現；部份漢人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主要是因為他（她）們體認到原住民的困境肇因於社會不公平，不是原住民自己不努力。這項體認，比單純地認為原住民勤勞還要來得關鍵。勤勞與否這項表面意象，還是要透過困境歸因解釋這種具體的推論判斷，才能夠有助於理解原住民優惠政策如何受到漢人的支持或抗拒。

漢人對原住民位階的認知，也是了解政策立場的重要背景。認為原

住民財富地位愈高的，對優惠政策愈抗拒；認為財富地位愈低的，則愈支持。這項認知對政策立場的效應，同樣獨立於個人客觀背景和其他主觀意象或意識型態之外，相當明顯；相形之下，對原住民政治勢力的判斷，就幾乎無助於解析政策立場。

對原住民的困境作何解釋，更是了解政策立場的有效指標。在基本的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族群身分、居住地 and 族群接觸經驗、一般意識型態、對原住民的意象和認知都相當的條件下，台灣的漢人如果認為「自己不努力」是造成原住民困境的主要原因，那麼對於照顧原住民的政策就會特別抗拒。再從另一面來看，如果體認到「社會不公平」是原住民困境的主因，則不論其他客觀背景和主觀態度如何，都會很明顯地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這兩項歸因解釋的等第波比係數都不低，所造成效應的顯著水準都達到 .001（表 6 行 4），跟教育程度、外省背景、東部、願意多付稅、贊成教方言、對財富地位的認知這些其他因素同樣是理解優惠政策立場的核心背景，有效呼應了文獻中所揭示的相關效應。

表 6 中唯一和文獻所載有明顯出入的分析結果在於社會距離的效應：漢人和原住民的社會距離愈遠，反而愈贊成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反之，愈願意女兒和原住民結婚的漢人，卻愈不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這項「情感」指標具有如此負面效應，似乎反映出部份台灣漢人對原住民的特殊族群情結：社會距離愈近、或者跟原住民有親屬聯結的意願愈強，則愈不希望原住民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如此發現印證著文獻上強調有關原住民「認同的污名」（謝世忠 1987）。就消極意義而言，這種情結意涵著親近原住民的漢人當中，不希望受到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污名化波及；從積極意義來看，則應該解釋作漢人族群在進一步接納原住民之際，希望原住民早日脫離政府的特別照顧，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來增強競爭力。

六、原住民對優惠政策立場的背景分析

從漢人眾多個人背景和主觀評價因素中，可以剖析出支持與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若干重要背景。這些效應是否也同樣出現在原住民當中？綜合前述文獻回顧，弱勢族群對自身的優惠政策抱持什麼立場，跟強勢族群的情況不盡相同。若干態度和立場之間的關聯似乎放諸四海皆準，但是兩者在社會上所處位階畢竟大為不同，所持意識型態背後也可能有不同蘊涵。這種差異在理解政策立場時有什麼作用，應該是分析弱勢族群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也是將弱勢族群和強勢族群相互比較的一項重要目的。

由於原住民調查的內容較為簡短，用來分析的自變項略少。如表 4B 所列出的簡單相關係數初步顯示，原住民樣本對我群的自我意象和困境歸因解釋，都跟漢人一樣，可以用來有效理解對優惠政策的立場。例如認為原住民勤勞，困境主因不在個人不努力、而是社會不公平的原住民，會更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可是社會公平感受的效應，卻跟漢人不同：認為社會對自己公平的，反而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

這些初步效應，在一併考量其他主客觀背景因素之後，產生些微變化。原住民對我群優惠政策立場的背景變異，可以從表 7 的等第波比分析結果加以論述如下。當同時考量基本人口特徵和社經背景時，男性、年輕、低收入的原住民比較支持優惠政策（表 7 行 1）。再將居住地、接觸型態、公平感、意象與距離、認知與歸因這些背景因素一併加入等第波比分析，原來的性別和年齡效應逐漸變得不再顯著，而個人收入的效應則幾乎有增無減。換言之，不論其他個人背景和主觀態度為何，原住民當中只要是個人收入較高的，就對優惠政策比較有所保留。

如果以個人收入代表社經地位一個重要的面向，則社經地位高的原

住民，不像社經地位低的原住民那麼強烈贊同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這樣的社經地位效應，跟上述漢人的情形剛好相反。教育程度高，對漢人而言是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的一項有利背景，對原住民來說卻沒有明顯

表 7 原住民支持或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背景分析

自變項	(等第波比係數)				
	(1)	(2)	(3)	(4)	(5)
男性	.208*	.162	.193	.162	.176
年齡	-.013*	-.012*	-.011*	-.011	-.009
已婚	.095	.093	.096	.092	.098
教育程度 (1-4)	-.049	-.023	-.011	-.002	.004
個人收入 (1-6)	-.055*	-.054	-.063*	-.064*	-.071*
都市 (鄉村)		.036	-.002	-.008	.008
接觸型態 (散佈)					
叢結		.340**	.321**	.321**	.297*
聚合		.350**	.329*	.316*	.282*
社會公平			-.088*	-.075	-.039
社會距離			-.017	-.014	-.017
勤勞				.059*	.057*
財富地位				-.074**	-.054
困境歸因解釋					
自己不努力					-.005
社會不公平					.410***
擬 R 平方	.006	.012	.016	.022	.032
樣本數	764	728	687	687	632

* $P < .05$, ** $P < .01$, *** $P < .001$



增強這種支持效應；而個人收入高，在漢人群中並不是了解政策立場的重要因素，在原住民群中卻發揮了顯著效應。收入高的原住民代表著在主流工商社會中事業有成，但是不論他（她）們對原住民的我群意象如何、如何看待原住民的財富地位、如何解釋原住民的困境，卻都很明顯地不像其他原住民那麼強烈支持原住民應該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這項發現似乎印證著族群關係文獻所記載，也呼應原住民社會中的若干現象：得以在主流社會中奮鬥成功的弱勢族群成員，不免反諸要求其他的我群成員努力再努力，不能一直靠政府的「施捨」。部份原住民僑界人士也常以自身為例，勉勵其他原住民向上。這些原住民對我群命運的立場、對原住民社會的認同與激勵、在其他原住民眼中的地位，的確都是檢討原住民政策時值得深究的議題。¹³

原住民對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還有其他異於漢人之處。例如認為社會對自己公平的漢人，偏向支持原住民的優惠政策（ $p < .05$, 表 6 行 4）；覺得社會對自己公平的原住民，則反而抗拒這項政策（ $p < .05$, 表 7 行 3）。強勢族群成員的社會公平感，有助於促使當事人樂意藉由政府力量多照顧弱勢族群；而弱勢族群成員的公平感受，卻讓人對我群的優惠政策持負面立場。原住民這項公平感的負面效應，在同時考慮對困境的認知和歸因解釋後，變得不顯著。顯然原住民對低落位階的認知，有效解釋了原有公平感對政策立場的效應（表 7 行 4）；而對困境的「社會不公平」歸因，又大幅抵銷了原有位階認知和公平感兩者的效應（表 7 行 5）。換句話說，覺得社會對自己不公平、認為我群財富地位相當低

¹³ 誠如本刊評審所指出，從表 2 所列平均數來看，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平均支持分數為 3.911，原住民則高達 5.096，明顯高於漢人。因此，收入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負效應應該解釋為「一般來說原住民都高度支持優惠政策，可是收入高的原住民不像收入低的原住民那麼強烈支持」，而不能理解為「收入高的原住民抗拒優惠政策」。

落的原住民，固然都比較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可是這種支持的效應主要是透過「原住民的整體困境肇因於社會不公」這種集體意識而產生，一旦訴諸這種「族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困境歸因，原有的個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對財富地位低微的認知，在理解政策立場時都不再是顯著的背景因素。

原住民跟漢人一樣，只要認為原住民勤勞、或者認知到原住民的財富地位低落，就會明顯地支持優惠政策（表 6 行 3、表 7 行 4）。可是這兩項效應在併入困境歸因一起分析後，發生不同變化：漢人樣本中的勤勞意象效應消失，對財富地位認知的效應依舊顯著（表 6 行 4）；原住民剛好相反，對勤勞意象的效應依舊，但是財富地位認知的效應不再顯著（表 7 行 5）。認為原住民勤勞的漢人之所以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其實是因為他（她）們同時也反對以「自己不努力」來解釋原住民困境，或者贊成「社會不公平」的解釋。認為原住民財富地位低微的原住民之所以贊同政府特別照顧原住民，也是由於他（她）們同時贊同「社會不公平」的解釋，而這種結構式的歸因解釋對政策立場有更強而有力的明顯區辨力。

至於困境歸因本身對政策立場的效應，在原住民樣本中只有「社會不公平」這一項顯著，「自己不努力」的效應幾乎不存在。正如前述文獻回顧所述，結構歸因（或外在歸因）不論對強勢族群或弱勢族群而言，都是區辨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有效背景，可是個人歸因（或內在歸因）則未必能清楚地據以了解政策的立場。這兩類歸因，都有助於區辨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但是其中只有結構歸因能夠有效解釋為什麼有些原住民特別支持或特別抗拒。

原住民調查中最獨特的地方，大概是「接觸型態」對政策立場的效應。前述漢人的政策立場不受到跟原住民接觸經驗的影響，但是東部則

顯現強而明顯的效應。接觸經驗以 15 歲後的接觸頻率來衡量，或許過於廣泛；而區域效應所反映出來的，也不能顯示實際上是透過什麼樣的接觸型式或內涵在運作。如前述，原住民樣本藉由兩個不同的接觸面向，建構三類「接觸型態」來作比較，呈現出日常生活中跟我群成員的具體「聚合程度」。跟「散佈」在漢人人口中的原住民比起來，那些「叢結」成群，或集體「聚合」的原住民，都很清楚地表達出對優惠政策的支持立場。這種叢結或聚合的效應，獨立於所有相關的主客觀背景因素之外，一直很顯著。這項效應說明了對分佈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樣本而言，散佈於漢人強勢族群人口當中的，顯然偏向於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而日常生活中跟其他原住民成員較有接觸者，則傾向支持優惠政策。

將這種跟我群成員的「接觸效應」再加以細分，又可以得到更精緻的結果。台灣原住民社會最近幾十年來最重大的變化，首推人口的都市化。經過三、四十年的外移，估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原住民人口長期居住在都市地區。¹⁴ 都市原住民的種種處境，跟多半住在原鄉的鄉村原住民差別甚大，所牽涉到的優惠政策內涵也不盡相同（謝高橋 1995，謝高橋等 1991）。因此，將原住民樣本分成都市和鄉村兩群，分別來探討，是了解現階段原住民政策立場的重要步驟。分析結果列於表 8。

原住民樣本分作城鄉兩群分析後，原有合併分析的少數效應不再顯著。例如勤勞的正面效應在鄉村和都市兩群都不顯著；有些效應則分別出現在不同副樣本，例如個人收入的負面效應，只有在鄉村原住民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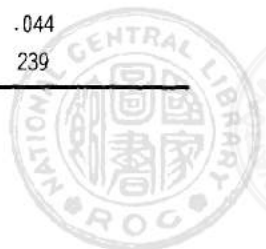
¹⁴ 根據近年的官方統計，1995 年底設籍在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五個省轄市及十六個縣其行政區域層級為市、鎮的原住民家戶內的人口總數是 120,251 人，佔了當時原住民整個人口數的將近三分之一（內政部統計處 1997：2，6，248）。上述範圍尚不包括行政區域為「鄉」，但實際上都市化程度相當高者，也不包括未設籍的都市原住民人口（參閱謝高橋、張清富 1991）。

仍然顯著，在都市原住民身上則幾乎不復存在。因此，前述收入高的原住民對優惠政策有所保留，應該是適用於鄉村原住民當中收入較高者。

表 8 鄉村及都市原住民支持或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等第波比分析

自變項	鄉村		都市	
	(1) 係數	(2) z	(3) 係數	(4) z
男性	.092	0.68	.254	1.38
年齡	-.010	-1.47	-.007	-0.70
已婚	-.008	-0.04	-.199	0.95
教育程度 (1-4)	.078	1.06	-.063	-0.77
個人收入 (1-6)	-.100	-2.42*	-.041	-0.80
接觸型態 (散佈)				
叢結	.247	1.24	.377	2.38*
聚合	.388	2.00*	-.186	-0.76
社會公平	-.048	-0.91	-.018	-0.25
社會距離	-.077	-1.12	.049	0.64
勤勞	.053	1.65	.058	1.29
財富地位	-.040	-1.11	-.064	-1.29
困境歸因解釋				
自己不努力	-.047	-0.38	-.034	-0.22
社會不公平	.323	2.21*	.495	2.96**
擬 R 平方	.037		.044	
樣本數	393		239	

* $p < .05$, ** $p < .01$,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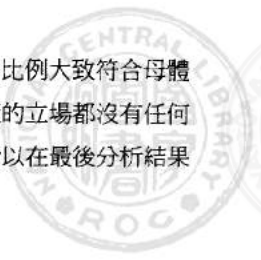
都市原住民的收入如何，並不影響到對優惠政策的支持或保留。

鄉村原住民和都市原住民兩群之間最明顯也最有意義的區別，落在接觸型態的作用。原來表 7 所揭示的聚合和叢結效應，到了表 8 的兩群副樣本各具特色。整體而言，散佈在漢人當中的原住民還是比較抗拒優惠政策。可是前述聚合效應，其實只出現在鄉村原住民副樣本中；都市原住民所顯示的接觸效應，則集中在「叢結」這一類型。換句話說，最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的都市原住民，不是散佈在漢人當中的那些人，也不是住在原住民社區、日常生活的接觸對象以原住民為主者，而是住家附近有部份原住民住戶、平常人際來往的對象不全是漢人，也不全是原住民的這種人。這種都市原住民似乎在族群散佈和族群聚合兩個極端之間，藉由分別跟我群成員和他群成員的適度交往，找到有助於增進族群認同、加強族群意識的模式。由這種接觸型態來區別不同地區的原住民，對於了解族群優惠政策立場這類社會心理背景確有明顯助益。如此透過不同面向來交叉剖析優惠政策立場的背景效應，所獲得的研究發現也有其重要的政策意涵。¹⁵

七、結論

台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由來已久，近十餘年來在原住民運動推動下尤其受到重視，政策涵蓋範圍得以擴大，實質優惠內容也更

¹⁵ 原住民樣本包括官方訂定的九族，加上平埔族和太魯閣族，各族比例大致符合母體的人口比例。經過多方嘗試分析，這些族群之間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都沒有任何顯著差異，加以各族在整個原住民樣本中所佔的比例過於分散，所以在最後分析結果中不再列出各族的差別。



加明確。政策的制定亟需多方檢討與評估，對於敏感的族群政策更需對所涉及的社會心理背景作有系統的了解。原住民優惠政策引起漢人與原住民不同的反應，即使在同一族群內部，也有不同意見。相關文獻上零星記載這些反應與意見，對於了解上述社會心理背景不無助益。本研究則依據相關研究經驗與成果，透過詳細研究設計，收集到最新近的大型調查資料，得以針對相關核心議題作有系統的多面向剖析。如此全面有系統地分析支持與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社會心理背景，該是本研究有別於其他論述的最大特色。

原住民優惠政策這種複雜的議題，既涉及社會正義、個人自主、工作倫理這些社會民主價值觀，也受到政經結構和意識型態的制約，更和歷史上的族群情結有關。這種政策跟其他政策一樣，無法跟民意的支持與抗拒長期脫節。對政策立場背後的社會心理加以剖析，當有助於制定或檢討政策。

但是針對如此複雜的政策議題，如何能夠釐清一般民眾的社會心理或立場？國外相關研究已經藉由周詳的問卷設計與不同統計分析，嘗試追蹤了解二、三十年來民眾立場的社會心理背景，並從中建構若干族群關係與族群優惠政策的重要論述。本研究在這項傳承之下，設計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的實證研究。在眾多複雜的背景因素當中，本文就相關變項作了多面向的探討，不但從漢人和原住民雙方的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居住地的城鄉與區域背景、對一般社會議題的意識型態等因素來考量，還同時考量對原住民族群的主觀意象、與原住民的社會距離、對原住民族群位階高低的判斷、對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等特定項目。有關漢人族群的分析，另外考慮到成年後接觸原住民的經驗，以及本省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三群的差異。有關原住民的分析，則特別檢視族群內部聚合程度所產生的效應。

本研究分析的資料，分別取自近兩年來「族群調查」中的漢人樣本，以及「原住民調查」中的原住民樣本。兩項調查的時間、訪問方式、抽樣方法、訪問對象雖然都不一樣，卻採用幾乎雷同的問項與測量標準，提供了相對稱樣本作為互相比較分析的對象。同時從強勢族群和弱勢族群的觀點來分析政策立場的背景，也彌補了一般研究只偏重強勢族群的趨勢。族群調查依據戶籍資料，經過分層抽樣後在全台灣各地施測，有效訪問到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原住民調查則利用電話調查，訪問到居住在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所訪問到的對象不再限於山地鄉等原居地的居民，也不集中在少數都會區的都市原住民，樣本所具有的代表性與客觀程度，明顯凌駕過去零星或局部的原住民調查。加上施測題目都是經過近十多年在各項調查不斷測試、修正過的重要問項，調查的結果能夠有效掌握跟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相關的核心議題。¹⁶

本研究若干主要發現呼應了國外文獻記載的一致研究結果，尤其是有關漢人強勢族群成員的立場背景，相當近似歐美民主國家中強勢族群的例子。例如高教育程度的強勢族群成員，對於優惠弱勢族群的政策都相當支持。對一般社會議題抱持較為開放之意識型態的一般民眾，通常也支持族群優惠政策。至於強勢族群成員對特定弱勢族群的意象和認知，也左右著政策立場。最為一致的趨勢，則是對弱勢族群困境所作的歸因

¹⁶ 本文分析項目盡量涵蓋相關的重要面向，可是從各項分析結果的擬R平方來看（都在.07以下），似乎所能解釋「原住民優惠政策支持與抗拒程度」的變異還是相當受限。如果將依變項的選項合併為少數（兩項或四項）來分析，所能夠解釋的變異量將會提升（例如表6最完整模型的擬R平方達到.135，幾乎是原來的兩倍）。但是合併後將簡化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區辨力，對若干現象難以解釋。以現有的分析項目來解釋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雖然揭示出若干有意義的議題，卻還有許多難以解釋的地方。這些盲點，除了在一般大型調查的過程中（包括問卷設計與實地訪問等）再求改進外，也需要在概念化過程中再求精緻，才能逐漸改善。

解釋，對政策立場的取向有強烈而明顯的區辨力。

有關原住民本身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分析，則得出不完全相同的結果。社經地位高的強勢族群成員，是支持這類優惠政策的中堅力量；社經地位高的弱勢族群份子，對優惠政策的支持程度則不如社經地位較低的我群成員。社會公平感在強勢族群當中有助於支持優惠政策，到了弱勢族群也變成抗拒的來源。最明顯的區別，是跟原住民的接觸經驗或型態，在漢人之間和在原住民之間產生了互異的效果，而在鄉村原住民和都市原住民之間的效應，也不盡相同。在東部多族群環境下的漢人，明顯地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這種抗拒難以歸咎於其他相關的主客觀條件，而是由「東部」這項背景單獨發揮強烈的效應。跟其他原住民較有接觸的原住民樣本，則顯然比較支持優惠政策。不過有利於都市原住民支持立場的接觸型態，不是極端的族群聚合，而是中等適度的叢結型態。

這些主要發現，應該成爲檢討原住民優惠政策的考量依據。九〇年代初期有關原住民困境歸因的研究發現中，強調爲了要有效改善原住民的社經困境，必須要靠漢人族群以及原住民自身的中堅份子共同支持，可是漢人知識份子與原住民知識份子對原住民困境的同情都相對地有限（傅仰止 1994b）。本研究發現漢人知識份子明顯支持原住民的優惠政策，而高收入的原住民（尤其是在原居鄉附近者）則不像其他原住民那麼強烈支持優惠政策。原住民弱勢族群在近年來已經在有利的社會政治大環境下以及藉由多方努力，在政策結構面上獲得若干改善。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爭取部份原住民中堅份子的大力支持，將是原住民運動未盡之使命。這種對優惠政策的不同支持程度，是否也突顯出高收入的原住民的確以自身奮鬥成功的經歷，苦心冀求其他原住民成員早日擺脫對優惠福利的依賴，也未嘗不值得深思。

有關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抗拒，並非東部居民的人口組

成、社經地位、一般的意識型態、對原住民的特定族群意象或情感、對原住民困境的認知與歸因解釋這些變異所能解釋。這項發現跟文獻上的記載相當一致：東部漢人的確對原住民特別不同情，甚至特別具有敵意。文獻上以族群意象、社會距離、歸因解釋這些面向來探測東部漢人的原住民情結，本研究則以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更直接揭露出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強烈抗拒。研究發現雖然無法點明東部漢人為何具有這種敵意，卻已經藉由多面向的探討，排除上述人口、地位、意識型態、族群意象、社會距離、困境認知、歸因解釋這些可能的肇因。排除了這些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背景，接下來的課題需集中在族群利益、歷史糾結、區域文化、特殊社會規範等面向，持續探究台灣東部這種區域內的族群關係副文化如何形成；原漢之間的族群意象、社會距離、族群位階認知這些主觀態度，又如何透過社會化過程成形；以及原漢間的接觸，如何在族群層次和個人層次中顯現出不同的形式與實質內涵，不同的接觸所導致的後果為何，這些接觸的細節與後果，如何在大型問卷調查中詳細施測，又如何藉由定點的長期深入觀察來釐清等。依據若干長期觀察結果（Hsu 1991：70-77），漢人的族群意象在東部不同原住民族眼中有相當差異。如此考量原住民內部和漢人之間的族群關係，也是深入了解東部原漢位階的重要途徑。以本研究所揭露的清楚研究成果作為基礎，配合既有文獻發現，如此探究必定有助於更進一步理解族群接觸頻繁區域內的原漢關係。

再以原住民的立場來檢視族群內部接觸對優惠政策立場的影響，則對於都市原住民的政策具有重要意涵。都會地區中的部份原住民聚居在少數族裔社區，不但引起媒體和政府機構注意，甚至引發「原住民性喜群居」、「以族裔社區作為原住民適應都市生活的典範」等論述或主張。但是衡諸都市原住民社區之居民數量以及龐大的都市原住民人口（內

政部統計處 1997)，住在社區的都市原住民人口比例相當有限。再依據本研究主要發現，如果以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來衡量，族群聚合或族裔社區並不是原住民在都市中得以提升族群意識、增強族群認同的最有效模式，反而是維繫中等適度的族群內部接觸，更有助於凝聚原住民的族群內部意識。不論是散佈漢人群中，或者是族群內部聚合程度高的原住民，都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持相對保留的立場。都市原住民的輔導及優惠政策，似乎也應該以此為鑑。

綜合跟東部漢人和都市原住民相關的這兩項特殊發現，可以再進一步推敲族群接觸的重要意涵。依據既有研究文獻，自認為和原住民熟悉的漢人，以及個人網絡成員中有較多漢人的原住民，都對原住民社經困境抱持著比較不同情的歸因解釋（傅仰止 1994b）。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則進一步呼應這項趨勢：東部漢人在多族群接觸的區域文化環境中，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特別抗拒；而那些散佈城鄉各地漢人群中、跟漢人接觸最頻繁的原住民，卻也是最為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的一員。換言之，漢人和原住民雙方成員在族群接觸的情境下，都加強了對彼此族群位階的體認，而雙方卻都同樣不能依據這種體認，來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族群接觸的形式與內涵，的確是探究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立場的重要議題。本研究業已透過我群的居住鄰近性、日常生活接觸對象中我群成員的比例這兩個形式，來衡量原住民族群內部接觸的內涵。如此嘗試在形式與內涵上考量族群接觸的效應，應該也值得應用到對漢人群體的探究。而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在不同的接觸形式與內涵下，如何導致對互動雙方的主觀整體評價，又如何引向對族群政策所抱持的特定立場，則需兼採不同論點與研究途徑，並藉由更複雜的研究設計與不同性質的研究資料及方法，來對探究族群政策立場所反應出來的族群關係作進一步貢獻。

當台灣原住民政策已經邁入「憲政主體化時間」，在原住民行政空

間逐漸「讓渡給作為主體的原住民本身」，「新的族群認同也必然經由此一空間的確立，而凝聚成新的民族生命」之際（孫大川 2000：119），原住民優惠政策在漢人與原住民雙方成員的認知中居於什麼地位？政策所受到支持與抗拒的社會心理背景為何？制定政策者如何理解、思索這些社會心理背景？又如何將支持與抗拒的意涵納入政策制定過程中一併考量？這些都是擬訂或修訂原住民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的議題。相對於這種接近「國家福利」觀點的弱勢族群政策，制定政策者也必須同時考量「反殖民」觀點的原住民政策（張茂桂 2000；張茂桂等 1998）。至於反殖民觀點的原住民政策，又如何受到原住民族群與漢人族群的支持與抗拒，則是值得從本文研究成果加以延伸的另一項重要研究方向。

基於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必要性與法定性，以及政策立場所蘊涵的重要意義，有必要長期比較分析漢人族群和原住民族群的立場。要建構長期比較趨勢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缺乏定期而一貫的調查。這項困難在國外民主先進國家沒有例外（Steeh and Krysan 1996），在國內更是如此。如何能夠藉著近年各項調查所立下的基礎，持續長期追蹤不同民眾對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及其背景，將是政策分析的必要任務。

作者簡介

傅仰止，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都市社會學、族群關係、社會聯繫與網絡、資訊與社會。目前研究計畫有網路世界的邊疆隱喻與非慣俗性、合唱團的社會聯繫等。



參考書目

山海文化雙月刊

1999 《歷年來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重要政策一覽表》。1999 年第 5 期。內政部統計處。

1997 《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華民國八十四年)》。行政院內政部編印。

王甫昌主編

2000 《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丹鳳(筆名)

1996 〈原住民資源不患寡患不均〉。中國時報，第 11 版，8 月 28 日。

什米有·吉洛

1997 〈原住民違建問題，應從務實面解決〉。中國時報，第 11 版，9 月 28 日。

瓦歷斯·貝林

1998 〈平權會第二次壓迫，原住民不服〉。自由時報，第 11 版，9 月 2 日。

伊慶春、傅仰止主編

2000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執行報告，八十八年度至八十九年度》。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998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臺灣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



2000a 《原住民權益手冊》〈修訂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

2000b 《政府採購法與原住民權益》。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

李亦園等

1993 《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委託。

李朝賢

1990 〈台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之研究〉。頁 55-74，收錄於台灣省政府經濟動員委員會主編，《宏揚台灣經驗迎接二十一世紀》。

洪永泰

1992 〈民意調查的抽樣設計〉。《研考雙月刊》16(1):22-32。

孫大川

2000 〈行政空間與族群認同〉。頁 97-123，收錄於《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高揚昇

1998 〈「肉桶政策」引喻失義〉。青年日報，第 6 版，4 月 19 日。

1999 〈原住民加分，彌補教育不平等〉。台灣日報，第 9 版，8 月 22 日。

2000 〈支持改進原住民聯考加分制〉。中央日報，第 25 版，3 月 10 日。

章英華主編

2000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章英華、傅仰止主編

2000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



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許木柱

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

務實（筆名）

1998〈盲目補助，扼殺原住民自覺〉。中國時報，第11版，4月15日。

張世佩

1994《族群競爭情境下的漢人與原住民互動：國科會大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刊。

張茂桂

2000〈原住民族與國家〉。頁199-201，收錄於伊慶春主編，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執行報告（八十八年度至八十九年度）。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茂桂、顏愛靜、傅君

1998《臺灣原住民對保留地政策之態度：一般意見調查及原住民菁英調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

傅仰止

1994a〈台灣東部的族群位階特色〉，《台大社會學刊》23:143-190。

1994b〈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觀點與原住民觀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35-87。

1994c〈台灣漢人民眾對原住民社經困境的個人歸因與結構歸因〉。頁91-133，收錄於伊慶春主編，《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

1995〈台灣族群的意象與位階：比較他群和我群〉。發表於「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的分析研討

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4月14日，台北。

1996〈人口比例與族群意象：東部原漢關係的結構性與社會心理基礎〉。《台灣社會學刊》20:125-161。

傅仰止、簡文吟、伊慶春

2001〈電訪樣本資料庫的再利用：以社會意向原住民專題調查為例〉。《調查研究》，第九期，編印中。

曾昭文

1999〈政府關懷，原住民不再弱勢〉。中央日報，第14版，5月8日。

歐蜜·偉浪

1997〈原住民鄉的最痛〉。自由時報，第11版，12月29日。

謝世忠

1987《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社。

謝高橋

1995〈台灣大都會原住民的居住隔離：以台北市為例〉。收錄於曹俊漢、柯瓊芳主編，《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面臨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專書。

謝高橋、張清富

1991《台北市山胞人口普查報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專題研究報告之一。

謝高橋、黃維憲、柯瓊芳

1991《台灣山胞遷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編印。

顧玉珍、張毓芬

1999〈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危機：山地鄉「平權會」政治經濟結構



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221-292。

Abrahamson, Mark and Valerie J. Carter

1986 "Tolerance, Urbanism and Reg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287-294.

Allport, Gordon W.

1979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Unabridged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Inc.

Blumer, Herbert

1958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1):3-7.

Blumer, Herbert and Troy Duster

1980 "Theories of Race and Social Action." Pp.211-238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Bobo, Lawrence

1998 "Race, Interest, and Beliefs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7):985-1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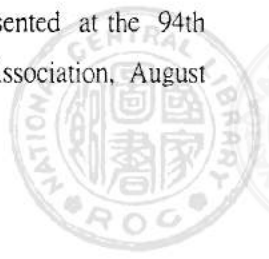
Bobo, Lawrence and Vincent L. Hutchings

1996 "Perceptions of Racial Group Competition: Extending Blumer's Theory of Group Position to a Multiracial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 951-972.

Dillion, Yolanda A.

1999 "Does Racism Really Matter? An Analysis of White Americans'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pen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4th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6-10, Chicago, U.S.A.

Feagin, Joe R.



1991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Antiblack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Pla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2):101-116.

Fu, Yang-Chih

2000 "Ethnic Enclosure and In-group Favoritism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Paper presented at 2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December 14-15, Taipei.

Gilens, Martin, Paul M. Sniderman, and James H. Kuklinski

1998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alig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59-183.

Hasenfeld, Yeheskel and Jane A. Rafferty

1989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67(4):1027-1048.

Hewstone, Miles

1989 *Causal Attribu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llective Beliefs*. Oxford,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Hraba, Joseph, Louk Hagendoorn, and R. Hagendoo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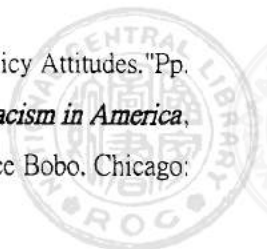
1989 "The Ethnic Hierarchy in The Netherlands: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8:57-69.

Hsu, Mutsu

1991 *Culture, Self, and Adaptation: The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Two Malayo-Polynesian Groups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Hughes, Michael, and Steven A. Tuch

2000 "How Beliefs About Poverty Influence Racial Policy Attitudes." Pp. 165-190 in *Racialized Politics: The Debate About Rac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O. Sears, Jim Sidanius and Lawrence Bob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ckman, Mary R.

1973 "Education and Prejudice or Education and Response S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327-339.

Jackman, Mary R. and Michael J. Muha

1984 "Education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Moral Enlightenment, Superficial Democratic Commitment, or Ideological Refin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751-769.

Kluegel, James R.

1990 "Trends in Whites' Explanations of the Black-White Gap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1977-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4):512-525.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2 "Whites' Beliefs About Blacks' Opport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4):518-532.

1983 "Affirmative Action Attitudes: Effects of Self-Interest, Racial Affect, and Stratification Beliefs on Whites' Views." *Social Forces* 61(3): 797-824.

Kuklinski, James H., Paul M. Sniderman, Kathleen Knight, Thomas Piazza, Philip E. Tetlock, Gordon R. Lawrence, and Barbara Mellers

1997 "Racial Prejudice and Attitudes Toward Affirma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2):402-419.

Levine, Jeffrey, Edward G. Carmines, and Paul M. Sniderman

1999 "The Empirical Dimensionality of Racial Stereotyp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3:371-384.

Lim, Mah Hui



1985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ity and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8(2):250-276.

Plous, S.

1996 "Ten Myths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2
(4):25-31.

Powers, Daniel A. and Christopher G. Ellison

1995 "Interracial Contact and Black Racial Attitudes: The Contact
Hypothesis and Selectivity Bias." *Social Forces* 74(1):205-226.

Quillian, Lincoln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4):586-611.

1996 "Group Threat and Regional Change in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America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3):816-860.

Sigelman, Lee and Susan Welch

1991 *Black Americans' Views of Racial Inequality : The Dream Deferr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Contact Hypothesis Revisited: Black-White Interaction and
Positive Racial Attitudes." *Social Forces* 71(3):781-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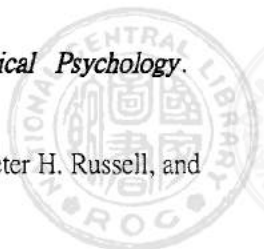
Sniderman, Paul M., Michael G. Hagen, Philip E. Tetlock, and Henry E. Brady

1986 "Reasoning Chains: Causal Models of Policy Reasoning in Mass
Publ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4):405-430.

Sniderman, Paul M., Richard A. Brody, and Philip E. Tetlock

1991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iderman, Paul M., David A. Northrup, Joseph F. Fletcher, Peter H. Russell, and



Philip E. Tetlock

- 1993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Prejudice: The Case of Anti-Semitism in Quebec."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0(2):242-270.

Steeh, Charlotte and Maria Krysan

- 1996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Public: 1970-1995."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1):128-158.

Tuch, Steven A.

- 1987 "Urbanism, Region, and Tolerance Revisited: The Case of Racial Prejud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504-510.

Wilson, Thomas C.

- 1991 "Urbanism, Migration, and Tolerance: A Reassess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2):117-123.



Supporting and Resisting Taiwan's Welfare Policy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ustronesian and Han Perspectives Compared

Yang-Chih Fu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aiwan's Han and Australasian peoples vary in supporting and resisting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taking extra care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how such variances reflect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s of the making of the aboriginal welfare policy. The data include a national Han sample (n=3349), taken from a face-to-face survey on Taiwan's ethnic relationships in 1999, and a national Aboriginal sample (n=807) from a telephone survey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2000. The ordered probit analyses reveal that Han respondent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aborigines in how they support the aboriginal welfare policy. The well-educated Han support the policy, but wealthier aborigines show notable reservations. While a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helps the Han to favor the policy, it becomes a factor for policy resistance amo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 sharp contrast is seen with people who have greater contact with aboriginals. In eastern Taiwan, where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ar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Han people strongly oppose the aboriginal welfare policy. This negative regional effect remains highly significant even after taking the responde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eneral ideology into account. It is also independent of how much contact the respondents have had with the aborigines, how the respondents perceive the image and the status of this target group, and how they attribute the aborigines' plight. In comparison, the aboriginal respondents who live in a state of ethnic enclosure tend to support the policy more strongly than those who live in a predominantly Han area. For those who move to cities, however, the most favorable contact pattern for policy support is not ethnic enclosure, but a moderate contact with other aborigines in the neighborhood as well as in daily life. Finally, it is evident that consistently attributing aboriginal plight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privation for both the Hans and aborigines leads to a very strong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polic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se major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ories of ethnic contact and ethnic group perception. It also proposes several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minority welfare policy.

Keywords: Taiwan's aborigines, Austronesian peoples, minority welfare policy, ethnic relations